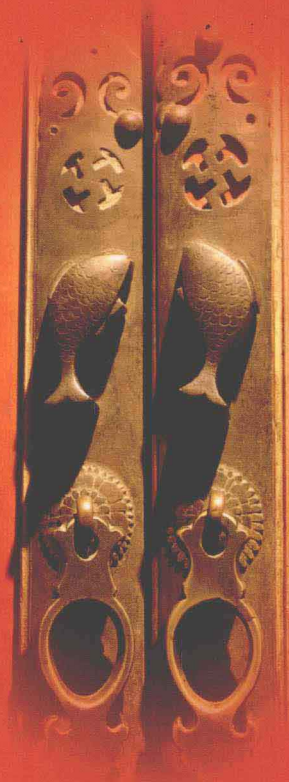


吳國光 著



改革的終結 與中國的未來



ISBN 978-986853230-4

00320



9 789868 532304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改革的終結與中國的未來／吳國光作．——初版

——臺北縣中和市：橙品印刷品，民98.05

面：公分．——（叢書）

ISBN 978-986-85323-0-4（平裝）

1. 中國大陸研究 2. 政治改革 3. 文集

574.107

98008085

改革的終結與中國的未來

作 著：吳國光

出 版 者：橙品印刷品有限公司

發 行 人：邱建榮

地 址：235台北縣中和市新生街192-1號

印 刷 所：橙品印刷品有限公司

電 話：(02)2223-1191

傳 真：(02)2223-1020

初版一刷：中華民國98年5月

·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定價320元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本書題獻陳逸品先生

目 錄

導 言	1
上篇 改革的終結	15
第 一 章 改革的終結與歷史的接續：兼及當代思想論爭	21
第 二 章 試論改革與「二次改革」：再論改革的終結	37
第 三 章 從「完美制度」到政治革命：三論改革的終結	53
第 四 章 政治改革、政治鎮壓與政治吸納：中國政治發展 及其挑戰	87
第 五 章 改革的異化與政治危機：中國改革的有效性和有 限性	101
第 六 章 政治改革：中國命運的窄門	121
下篇 中國的未來	147
第 七 章 略論「縣政中國」：從分權到民主化	153
第 八 章 構造「民主工程學」：再論「縣政中國」	167
第 九 章 反政治的自由主義：從胡適的憲政思想反省憲政 主義在中國的失敗	199
第 十 章 從胡適之到李慎之：片論中國自由主義的歷史發 展	219
第十一章 中共「八大」與「反右」運動	231

第十二章	語言的二元化與人格的分裂：試談語文教育的政治與中國的民主化.....	255
第十三章	「精緻宣傳」的出現：後改革時代的中共媒體.....	263
第十四章	多重的真相還原：何清漣著《霧鎖中國》與中國媒體研究.....	277
第十五章	剖析國家，透視權力：試論中國政治研究在中國的創建和發展.....	293

導言

(一)

中國是一個不容易看清楚의國度，這就激發人們致力於看清楚它的努力。本書即是試圖看清楚中國政治的努力之一。它的焦點，聚在對於當下中國政治的歷史方位的觀察和思考：自一九七八年肇始，到二零零八年冬天，中國改革已經在紀念自己的三十周年了，這個時候的中國，究竟處在什麼樣的政治和經濟的經緯度上？中國這艘巨大的航船，正在駛向什麼方向？不同於中國官方的定位，也不同於中外學界流行的言說，本書立一家之言，收入了作者在二零零二年首次提出「改革終結論」的論文，及隨後系統論述這一論斷的其他文章。中國的改革已經在二零零二年終結，中國進入了改革終結之後的以「分裂的穩定」為特徵的新的歷史時段，這就是本書對於中國當下歷史方位的判斷。

改革之後的中國向何處去？不同的人，對此有著南轅北轍的願望，因此也有截然不同的答案。圍繞這個問題，本書開拓了三個方面的研究，從制度重構、歷史反省和認識論的清理等不同角度，試圖倡導一種具有分權、包容、切實並理性等特點的政治和言說環境，在建設這種環境的過程中探討中國的未來。這是一種開放的態度，也是一種互動的態度，還是一種學習的態度。換句話說，中國的命運和未來，不決定於任何人的一言九鼎，也不決定於冥冥中的不可把握的力量，而是決定於人們，包括中國人、廣義的華人、乃至整個人類，能不能用開放、互動、學習的態度，來切實地認識中國現實，清醒地反省中

國歷史，並批判性、創造性和建設性地討論中國的制度重構。

提綱挈領，本書題為《改革的終結與中國的未來》。

(二)

收入本書的，是我自二零零二年以來所寫的中文學術論文，¹ 也包括了幾篇形式上不那麼規範、但是討論的內容比較具有學術色彩和思想深度的文章、採訪和對話。這些文章絕大多數都已經在刊物、網站或者別的文集中發表過了，但是發表的渠道和時間相當分散，很難見出它們之間其實是存在一些內在的邏輯聯繫的。同一個作者，觀察、思考、研究和分析問題，總是有他一定的連續性；而僅僅通過分散發表的文章，這種連續性往往就看不大出來了。現在，有機會把這幾年的論文集結到一起來出版，應該是有助於見出一些內在的聯繫、邏輯和連續性的。在這篇「導言」裏，我也想粗略地理一理這種內在聯繫，以便為認真的讀者提供某種閱讀、理解和批評本書的線索。

這些線索，都是圍繞「改革的終結」和「中國的未來」這樣兩個大題目的。簡單地說，可以分成五個方面。即：對於中國改革的現實狀態的思考；對於中國政治改革的分析；有關中國政治制度重構的一種思路，即所謂「縣政中國」；對於中國近代政治歷史的相關回顧；對於中國問題在認識論層面的反省。

¹ 本人二零零二年之前的一段時間的中文學術論文，集於吳國光，《自由的民族與民族的自由》（臺北：大屯出版社，2002）；而在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六年之間所寫的比較具有學術和思想色彩的中文文章，則見於吳國光，《自由化·制度化·民主化》（臺北：風雲論壇出版社，1997）。至於一九八九年之前的學術論文和一些比較具有學術、思想色彩的論文，則曾經結集為《思想的酸蘋果：吳國光自選集》（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和吳國光，《政治的五色燈籠》（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這兩本集子，和另外兩本書（一本是學術專著，吳國光，《論馬克思的新聞思想》，北京：中國新聞出版社；一本是雜文集，吳國光，《不死鳥》，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本皆預定一九八九年出版，但是都在天安門鎮壓之後被分別查封在印刷或編輯過程之中了。

如上所述，本書的第一條線索，是對於中國改革的現實狀態的思考。這個思考的結論，簡單地說，就是兩個：一個是「改革終結論」，一個是「兩次改革論」。這在收入本書的前三篇文章中，有比較系統的論述。說「比較系統」，是從我作為提出者的角度來看，認為自己已經就這些判斷的主要方面展開了分析，提出了論據。但是，從批評者的眼光來看，這些論述可能還是很不夠的。最早提出「中國改革已經終結」這個看法的〈改革的終結與歷史的接續〉一文，寫在二零零二年年初。²兩年以後，我寫了〈試論改革與「二次改革」〉，首次提出了「兩次改革論」。從那時到現在，六、七年的時間已經過去了，現實的發展應該可以進一步證明或者證偽這些看法了。從我的角度來看，當然發現了更多的證據，來支持自己的看法。這表現在〈三論改革的終結〉這一長篇談話中。但是，圍繞這些看法，卻一直都是爭論的。成文的商榷，我在相關論文中引述，這裏不去重覆。二零零九年一月，我應邀訪問日本早稻田大學，在和日本的中國研究學界座談的時候，大多數學者，包括日本學界的中國政治研究的領袖人物天兒慧教授、毛理和子教授、菱田雅晴教授等，都表示不同意我的「改革終結論」。樂觀者認為，中國改革還在進行，還要進行很長時間；比較不太樂觀的學者則認為，中國改革只是比較緩慢了，或者有所停頓，但應該只是階段性的現象，我們還可以預期以後的中國會再次出現改革的高潮。我想，這裏有對於「改革」作為一般概念和「改革」作為特定概念（即作為一九七八年以來的那種改革）是否做出區分的問題，也有對於「改革」的內容如何界定的爭議（這兩點，我在〈三論改革的終結〉的對話中討論到了），還有對於時間概念的不同理解。當然，也有學者贊成我的看法，那是因為我們在上述問題上持比較相近的方法論。對於本書讀者，我建議他們先看〈從完美制度到社會革命：三論改革的終結〉，有興趣的話再回頭去看前面那兩篇。這樣不

² 公開提出這個看法，還要早一點，是在二零零一年十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舉辦的一次座談會上。

僅節省時間，而且可以先有方法論上的溝通，交流比較到位。我歡迎讀者針對我的方法和概念而展開爭論，並進而對我的論據和判斷提出批評。

對於中國政治改革實際進程的評估和判斷，也是導致人們對於中國改革的性質和階段產生不同看法的一個重要原因。本書的第二個主要線索，就是回顧、分析和理解政治改革在中國的實踐，或者這種實踐缺位的情況下中國的政治發展狀態。第四章到第六章，集中探討了這個問題。簡單地說，關於中國政治改革的評估，有著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沒有政治改革，只有經濟改革；另一種看法，則認為中國的政治改革一直在進行，大體上與經濟改革是相匹配的。而圍繞前一種評估，又有兩種不同的分析邏輯。一種為多數學者所贊成的看法，是把政治改革的缺位看作中國經濟改革造成諸多社會問題的根本原因之一，因而是否定和批評這種政治改革滯後的現狀的；也有一種觀點認為，沒有政治改革，並不妨礙中國的進步，這反而可能是導致中國經濟改革成功的重要因素，因為這從政治上保障了經濟進步所必需的社會穩定狀態。我的看法，接近前一種，但並不是那麼簡單直截。我基本上持一種歷史主義的態度來觀察中國的政治改革，就是說，以歷史的、發展的、動態的眼光來看問題，把政治改革放到具體的歷史背景下來分析。這樣，我發現，中國改革進程中有兩次重要的政治改革嘗試；而這兩次嘗試的內容是有所不同的，歷史命運也很不一樣。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由胡耀邦所主持的政治改革的嘗試，聚焦在規範高層政治生活，成功地改變了毛時代以來領導職務終身制、最高領導人「個人崇拜」等制度，形成了新的高層運作方式，從而為八十年代的經濟改革提供了政治保障。八十年代中後期，趙紫陽再次進行政治改革的嘗試，焦點在於調整國家和社會之間的權力關係；這次努力最終為天安門鎮壓所埋葬，而這次政治改革的失敗則形成了一九九零年代中國迅猛市場化的政治背景。在本書第六章中，我對此有比較多的討論。接下來，中國的政治發展，就主要不

是以政治改革為內容了。這一部分，我也建議讀者從第六章看起，然後折回到第四和第五章。在弄清楚歷史背景的基礎上，來談後續發展，庶幾可以避免一些空談、想像和前無古人的「忽悠」。

(三)

嚴肅的學術探討不是算命先生的神機，要其預言未來，那是很困難的。但是，這並不是說，我們對於未來就完全沒有任何感知。對於一個健康的社會，未來深埋在那個社會的成員對於自身歷史的深入瞭解之中，未來形成於這些成員基於這種瞭解而展開的自由、理性的公共討論之中。在這樣的討論中，人們對未來可以提出不同的設想，經過健康的批評而逐漸形成有希望的通往未來的建設方案。如果這樣的（可以是多種多樣的）方案既具備理性基礎、又獲得公共支持的話，則未來就可以這樣在討論中變得清晰起來。

可惜，中國社會缺少這樣的對於自身歷史的瞭解，更缺少這樣的自由、理性的公共討論的言論環境。不僅是中共的政治專制阻礙了這種瞭解和討論；即便是不在中共直接統治之下的香港、臺灣、海外華人社會，似乎也並不容易實現這種「思考」(deliberation)。關於這個問題，我在這篇「導言」的最後部分，準備有所討論。這裏，先談本書在這方面所做的三個方面的嘗試，即歷史反省、認識論的努力、和個人對於未來中國制度重構的獻策。這三個主題，構成三個不同的時間面向：歷史反省是向後看的，認識論問題是著眼當下的，而所謂「獻策」則是面向未來的。總起來，它們是一個民族關注自己未來的基本方式。

這裏，必須指出的是，我的所謂「獻策」，不是對當政者的獻策，而是對於這個民族的獻策。如前所述，如果一個民族能夠自由、理性地通過公共討論來建構自己的未來，則每個公民都有責任、也有可能向這種討論貢獻自己的意見，包括某些具體的政策設想。正是在這個

意義上，這可以叫做「獻策」。本書第七、第八章，獻出了一條「縣政中國」之策——這也構成本書的第三條線索。³簡單地說，「縣政中國」建議以縣級為基本單位，重新組織中國的政治生活，實行全國與縣級兩級政權的架構，縣級以下民眾自治，縣級實行民主普選，全國則通過縣級地方民主來實行不是聯邦制的地方分權。對一些人來說，這聽起來也許是一個荒唐的設想，聞之未免「大笑之」。可是，事實上，二十世紀前半期中國那些尋求政治變革的志士仁人之中，很有一些人，包括孫中山，持此主張。不謙虛地說，我的建議，較之一百年前的那些討論，不僅有時代的新意，而且設想更為合理和具體。一則是因為時代發展了，我們今天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來看問題；二則也是因為學術訓練的好處，我今天是在安靜的書齋裏思考這個問題，而前人多是動蕩時代的政治活動家。我很高興地看到，這個建議在中國大陸一些學人那裏，得到了甚為積極的應和。就是一些批評和商榷，也促使我進一步思考問題、闡明觀點。在此，我藉機向他們表示感謝。

本書的第四個線索，是歷史的反省。中國最豐厚的精神和文化資源，當屬歷史；惟其豐厚無比，國人既常常不知珍惜，反省亦往往無從下手。本人遊學西方二十年來，見到美國人對於歷史物件的深自珍惜、英國人對於本國歷史的深入研究，不免感慨萬端。自己史學根底有限，治學重心亦不在此，僅在對於歷史的管窺之中，試圖尋找理解今日中國政治的助益。本書收入的三篇相關文章，分別涉及近代自由主義與當代中共歷史這兩個範疇。對於比較喜歡理論討論的讀者，不妨去讀〈反政治的自由主義〉一文（本書第九章），並請給出批評；而對當代歷史的戲劇性發展更有興趣的讀者，希望〈中共八大與反右運動〉（本書第十一章）能給您提供某些閱讀的樂趣，也能提供某些

³ 有批評者注意到了我的「縣政中國」有「獻策」的涵義，但是不能理解除了向當今執政者獻策之外還可以有這種面向民族的獻策，因而引起一定的誤解。請參見本書第八章相關段落對此的澄清。

超越了樂趣的進一步思考。

以上兩個層面的努力，是在嘗試從歷史反省和制度創新中尋找中國的未來。然而，無論進行歷史的反省，還是嘗試提出制度創新的看法，或者評價與分析中國的現實，都會採取某種（或多種）特定的認識和研究方法，都必然是在某種給定的公共討論的生態環境下展開，都往往形成與自身所屬民族、乃至與整個人類的既有智慧和當下思考之間的對話。在多年的這種學術活動之中，我有一個很深的體驗，就是覺得我們的認識和研究方法需要提高，我們的公共討論生態應該得到建設和改善，從而能夠促使智力對話健康、理性地展開並深入。一般地講，對人類認識活動來說，都存在這樣的問題；具體地說，我們中華民族對於社會政治問題的討論，似乎在這些方面尤其遇到挑戰。說得不太客氣一些，那就是：我們當代的中華民族這些成員，至少在社會、政治問題上，認識方法和研究方法總起來看是很落後的，公共討論不僅空間不大，而且質量也是很差的，公共討論的總體生態環境是不適應整個民族渴求進步、發展、提高而在智慧上的要求的。改變這種情況，在我看來，是很重要的事情，與尋求物質進步、改革政治制度等等這些事情相比並不次要。事實上，如果這個方面沒有改善、進步和提高，物質進步並不能真正給一個民族或整個人類帶來更好質量的生活，也很難找到一種健康的方式展開制度層面的變革。多年來，我都強調要尋求「中國進步的智慧支持」，就是這個意思。因此，在關注中國未來的時候，我覺得應該關注中國人如何討論公共問題。這當然是一個很大的題目，我只能從自己狹隘的角度來展開對於它的探討。本書的第五個線索，就是這種認識論的關懷；書中最後的四篇文章，都是與此相關的。它們涉及我們所使用的公共語言本身，也涉及對於中國媒體資訊的辨識，最後歸結到「中國政治研究」作為社會科學領域的建設問題。

(四)

瞭解中國過去幾年政治問題討論情況的讀者會意識到，本書的多篇論文，都頗有「標新立異」之嫌。不論是「改革的終結」、「兩次改革」、「縣政中國」這些論點，還是「語言二元化」、「精緻宣傳」、「兩個不惜代價」等等概念，都是我的始創。有一些概念，比如「反政治」、政治領域的「工程學」等，則有英文文獻的根基，但也是我第一次把它們拿到中文世界裏來，並且予以發展來概括和解釋中國的事情。惟其為始創，故不一定成熟，故容易引起爭論，故需要批評和探討。所以，我這裏指出這種「創造性」，並無炫耀之意，而在於圍繞這些始創來談一談思想討論和學術批評怎樣才可能比較健康、理性。這與上面談到的認識和研究方法問題、公共討論空間的生態環境問題，是一脈相承的。

其實，把「一」說成「一」，既不是炫耀，也不是誇張，只是在實實在在地敘述現實。思想和學術討論應該超越世俗生活中的某些習慣；何況「發明」、「創造」也不一定就是好東西，因為人們很可能發明創造壞的、有害的東西。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尤其如此；我們被不好的概念發明和理論創造所毒害的情況還少嗎？當然，一個概念好不好，一個結論對不對，是要在公共討論中辯論的，是要在進一步的科學研究中探索的，也是要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驗證的。只靠實踐驗證，那需要足夠長的歷史過程，也需要足夠大規模的社會實踐，為此人們可能會付出很高的社會成本。因此，健康的公共討論和理性的社會科學研究，對於社會政治問題，就變得尤其重要。

一個有某種原創性的想法面世之後，在公共討論當中，大體上不過就是三種反應。一種是贊成，一種是批評，再一種就是基本上贊成，至少是贊成這個議題的價值，但也有不同程度（可以是很大程度）的批評，那就是圍繞這個想法有進一步的探討。有沒有第四種情況，即基本上不贊成，但也還作進一步的討論的呢？應該是不大有，因為如

果你基本上不贊成某個想法、結論或概念，就不會沿著它那個方向去深入討論了。所以，一個想法出來，受到批評，引起討論，這是很好的現象，說明這個想法有一定價值。在學術世界生活的人，都知道，一場研討會，幾個人發言之後，到了開放提問討論的階段，如果有發言者沒有收到任何問題，那是有些尷尬的，說明沒有人對這位發言者有興趣，甚至說明他（或她）的發言沒有什麼價值。這時候，老到的會議主持者，往往會特意對這位發言者提問，以改善會場氣氛。因此，在思想和學術討論中，「謝謝你的問題」並不是一句客氣話。作為一個中國學人，我在這種規則下也已經生活了二十年，所以，我絕不會反感、敵視和排斥別人對我論點的質疑、提問、批評和反對。恰恰相反，也許我在對質疑的回答中有時候使用的詞語很不客氣，但這絲毫不妨礙，我對那些提出質疑和嚴肅批評的論者，總是抱有深深的敬佩和感激。

反過來，單純的贊成因此也就沒有什麼思維層面的意義。思想討論不是政治表態，越多的人擁護就越好。當然，在社會政治問題的公共討論中，一個觀點如果能夠贏得較多的人贊成，也有它的政治和思想意義；這一層，不用多說，也是很容易明白的。比較糟糕的，是那些這樣的贊成者，他們把你的觀點拿過去，當作自己的看法來闡述，不僅不註明出處，而且闡述成他們的版本。據我的有限瞭解，本書中的「改革終結論」、「兩次改革論」、關於縣級治理的一些具體觀點，都遇到了這樣的命運。為什麼這樣做很糟糕呢？這裏爭的不是發明權，因為這一則並無專利，二則我們已經談到過發明壞東西的可能。這裏強調的，還是討論的規則與質量問題。規則是為了保證質量的，質量是需要責任認定的。拿別人的觀點而不註明出處，這是沒有規則，在學術界就認為是剽竊了；對於同一個觀點，不同的人的解說，即使基本觀點一致，仍然會有不同的偏向（否則就不必再來解說了），如果不加以註明，那就把概念攪渾了。而討論問題的基本前提，就是概念要清晰、一致。同一個概念，比如「兩次改革」，吳某人這麼說，

別的人那麼說，又不說他那個東西與吳某人所說的東西是什麼聯繫與區別，這樣的問題討論，能有什麼進步呢？馬克思刻薄，會說「種下了龍種，收穫了跳蚤」；我的感覺，就是很可惜。不是可惜我的概念、我的創造，而是可惜別人的概念、別人的創造。本來，事情很簡單，你可以說：「兩次改革」這個觀察，吳國光二零零四年提出來過，但是他是那樣一個意思；我今天加以重新界定，強調的是這樣一個意思，如此如此。這樣，我們的討論就豐富了，至少有了兩個有關聯又有區別的「兩次改革論」；我們的討論也就深入了，因為吳國光的那個「兩次改革論」所忽略的東西得到了新的闡述。這樣，關於中國改革的討論，就可以有所進步、有所深入。何樂而不為呢？

這當然是關於公共討論的生態質量的問題。另一方面，我要遺憾地說，也並不是所有的批評都是有意義、有價值的。「批評」的本意，在思想和學術討論中，應該是前述第三種狀況；但在我們經常見到的實際討論當中，卻常常不免走上歧途，那就是並不能把問題的討論引向深入，而是把它庸俗化。比方說，對於我的「兩次改革論」，有一種批評說，因為作者本人參與了八十年代的改革，所以美化八十年代的改革，貶低九十年代的改革。又比如說，對於我的「語言二元化」一文，也有批評說，作者一九八九年之後積了一肚子氣，文章寫出來都是酸的。我不是不能承受這樣的批評：這些批評既不尖酸，也不粗蠻，其中關於我參加八十年代改革和一九八九年之後境況改變的說法，也不是瞎說，哪有什麼不能承受的呢？問題是，這樣的批評是無助於討論問題的。如果直接回答說：因為您屬於九十年代以後得到好處的精英聯盟，所以就美化九十年代——這就變成吵架；如果解釋說，我沒有什麼酸氣，更沒有什麼怨氣，我現在活得比一九八九年之前開心——這不是很無聊嗎？

所以，我認為，問題的關鍵，在於回到公共問題的嚴肅討論這樣一個範疇裏來。我們討論的是關乎公眾利益的問題，採取的是嚴肅的學術態度，是使用論據、概念、推理等人類思維的基本工具來探討問

題。我不能說我的經歷和偏見不會影響我的判斷；但是，這個判斷是不是有道理，是應該根據證據是否恰當、足夠，概念是否準確、清晰，推理是否合乎邏輯等等來看的，而不是根據作者的性別、年齡、民族、國籍、出生地、婚姻狀態、身份、地位、黨派、收入、學歷、經歷、信仰、愛好等等這些非思維的因素來看的。這些因素可以影響作者注重或忽略某些東西（如果有這種不適當的注重或忽略，這是批評者應當指出的），甚至影響作者做出這樣或那樣的判斷，但作者的結論是否有道理，並不是根據他的經歷、地位、信仰等前述非思維因素可以判定的。思想面前，人人都有相同的發言權，每個發言者也都要接受相同的評判。這就是政治討論和政治運作的不同。在政治運作中，今天的中國，胡錦濤的發言，比中國共產黨其他七千萬黨員的發言，無疑更有份量的多；可是，在政治討論中，我們必須明白，胡錦濤關於中國共產黨的性質、狀態、功能等的判斷，並不比任何另外一個人的相關判斷更有道理或更沒有道理。

我注意到，這種習慣於把個人因素代入公共問題的討論（take personal）的態度，對於我們健康、理性、有深度地探討中國問題，往往構成不小的障礙。按照那種追尋個人經歷而檢驗論點是否正確的做法，參加過中國改革的人，就沒有資格討論中國改革，因為他們無可避免地、多多少少地都會有個人經歷的偏見。可是，同一種做法，有的時候又排斥沒有參與經歷的人的發言權。你不在中國，所以就不瞭解中國，因此就無權討論中國問題——這也是我們時常聽到的一種說法。反過來，如果有人認為，只有參加了中國改革的人，才能正確地討論中國改革；或者只有遠離中國的人，才能客觀看待中國，豈不也是一樣荒唐嗎？這裏，我想強調的，還是認識論問題。科學本身的出現表明，人們的認識能力，是可以超越本人經歷的侷限的，也是可以超越本人利益的侷限的。否則，一切科學研究，都將成為不可能的。不光是自然科學的研究可以有這樣的超越，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也一樣有這種可能。否則，沒有人可以研究歷史，因為當代無人經驗過